第一部分　国家报告综述

国 家 报 告 综 述

达雅·克里希那

对已经收到其报告的国家，可以按照不同的看法划分为一些组，可以设定各组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可能共同具有它们本身的一种可以公认的同一性。例如，分组的标准可以是宗教，殖民统治，过去的哲学传统，文化区域的成员，一种激进革命的经历等。比如说，可以根据宗教将一些国家分为伊斯兰教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基督教国家如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教和佛教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泰国、日本和韩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有无殖民地的经历将一些国家分组，我们就会将中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包括在无殖民地经历的一组，而将其余的国家包括在有殖民地经历的一组。在有殖民地经历的国家中，我们还可以区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如菲律宾；另一些曾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如韩国，或者历史上曾受中国和法国支配的国家如越南。对已经历一种激进革命的国家，我们可以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越南、中国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划分为另一组，其中，后三国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曾经历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后三国似乎可以再划分：越南看来更倾向于苏联的共产主义革命，而中国在其革命政策中，或者至少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意识形态的论辩中,如果不说是反苏联的路线的话,则是执行一条非苏联的路线。苏联的中亚地区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它可被看作有别于另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和越南，那是由于这一事实：在它那里很久以前就发生了革命，而甚至现在，它还拥有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人口。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一组，可以说包含那些脱离印度独立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在某一时期，在文化上和行政上曾是印度的构成部分。在所有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中，可以设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构成它们自己的独特的一组，因为它们的居民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感到，即便他们从地理上说碰巧住在亚洲，但自己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却属于西半球，而不属于亚洲。

根据上述这些不同标准分组所表现的多样性，预示着对这些国家的哲学情况作任何认真思考，必然会遇到一些难点，提示着对已收到其报告的这些国家的各种有别的同一性，要有 敏感性。然而，应当注意到，它们的差异大都是同这些国家的往昔历史分不开的。就现状而言，这些国家都分有一种派生自世界形势的共同情势，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现时代都存在于这种形势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两难困境：怎样对待它们的往昔历史，这种往昔历史使它们成为现在的样子，给予它们自身独特的同一性，同时它们又不能依然满足于这往昔历史。理由很简单：如果它们必须生活在现代世界，它们就不得不接受当代的准则，这些当代的准则，主要是由欧洲或美国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所规定的。 人们并不曾预料这种两难困境会表现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那样的国家，那里居住着来自英国的移民，它们属于西方的文化。然而，新西兰的报告令人惊奇，它指明了关于该国的毛利人往昔历史的冲突；虽然澳大利亚的报告没有显示任何这类关于该国的往昔历史的冲突的迹象，但是它也并没有表明对该国哲学情势有什么较为乐观的自我意识。甚至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范型依然是英国和美国．它们的哲学旨趣和活动中心，看来是在本国之外，而不是在本国之内。

然而，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的往昔历史本身，在特性上，特别是关于哲学领域的传统。一直是极不相同的。例如印度，可以说有一种良好发展了的2000多年之久的哲学传统。而另一方面，象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不仅不曾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该国的基本哲学活动，甚至在本世纪头十年左右之前，尚未开始。还有，在这些国家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受到西方的哲学传统的不同的影响。例如，象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曾有4个世纪受西班牙统治（1521年至1898年），因而可以料想它受到一般的西方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哲学思想的极长时间的影响。另一方面，泰国接触西方哲学只是在本世纪60年代初，而土耳其在1900年就有了它的第一个哲学系此外，在阿塔杜克·凯末尔所开创的改良主义革命之后，土耳其曾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汉斯·赖兴巴赫，他自1933年至1936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执掌教席。甚至更早一些，雅可比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教哲学史，并且可得到庞加莱著作的土耳其语译本了。实际上，据说奥古斯特·孔德曾给穆斯塔发·雷泽特·帕夏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试图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观点．对坦齐玛塔（Tanzimat）运动作一说明，希望使土耳其皈依他的“伟大的人道教”。后来，在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组建之后，象W. 克朗兹、E. 冯·艾斯特、H. 汉姆苏斯和J. 里特尔这些著名的德国教授在那里任教，直至本世纪60年代。实际上，从土耳其的报告看来，一般说法国思想家，特别是法国实证主义，对土耳其哲学家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预料的显得更大。据报告，在韩国，最初触及哲学早在1631年。和土耳其的情况一样，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如W.V.Q.奎因教授，S. 胡克教授和K. 洛维斯教授，都曾去那里讲课。

除了关于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性质和深度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这些国家在开始受西方影响之前它们的哲学传统的性质问题。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曾处在印度或中国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内，自然可以料想．它们曾受到来自印度和中国哲学思潮的影响。印度的影响主要在佛教领域，这种佛教给斯里兰卡、越南、日本、韩国和泰国

的哲学传统提供了背景材料。中国在哲学领域的影响主要同儒学和道学相关。斯里兰卡早在公元前 3世纪就感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泰国自 13世纪以来才有佛教。朝鲜在公元前57年至公元 558 年之间，通过中国接受了佛教。儒学约在公元 372 年左右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从公元630年至854年即佛教传到朝鲜之后，通过中国的书面译者和口译者，接受了佛教。在越南，儒学、道学和佛教也来自中国，并且在该国有 1000年的主导性影响。

除了印度和中国在这一地区曾起过2000多年文化上的优势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事实：这里的某些国家曾对另一些国家起过军事支配作用。例如，中国在越南实行政治统治达1000年，在朝鲜也实行了长期的统治。日本则在 1910年将朝鲜殖民地化，日本在那里统治的全部时期，对朝鲜的本土文化起有严酷的影响。这一事实的意义，须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因而就有一个不仅关涉到西方哲学，而且也关涉到传统哲学的问题，这种传统哲学至少在其中某些国家看来，是同一种较早期的统治相联系的，或者说，它至少被视为不同于这些国家自身本土的传统。于是，它们就有一个中国和印度都不必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结果，在这些国家对待来自先前统治过它们的国家的现行哲学影响、文化影响的态度中，往往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因素。

持这种态度的准则，可以说是超越了其他一切准则，它涉及这里某些国家中发生的激进革命，以及这种激进革命对思想生活特别是对哲学领域的影响。中国、越南、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说是属于这种类型。中国人、越南人、苏联中亚地区的人，已经历了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梅尼领导下，已经历了可称为原教旨主义类型的伊斯兰革命。

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哲学传统，但是中国人民在十月革命（1949年）之后，面对如何对待旧传统的问题，从共产主义观点看

来，这种旧传统主要由反动的意识形态构成：儒学、道学和佛教。中国的报告提到在1966至1976年文化革命期间令人瞩目的形势变化，目前的中国政府努力在思想、文化和政治方面否定文化革命。在这样一种情势中的哲学，可以看到，一方面，主要关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主要关注杜绝从过去的封建结构和现今的资本主义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谬误的哲学。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思想教育中，意识形态的教育占有一个中心地位。因此，在这些国家的中学和大学里都教授哲学。

在越南，在院校的高年级教哲学，但是过去，在大学这一层次长久没有哲学教学。只是从1936年以来，才在所有高等院校教哲学。1967年建立了一个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该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如今，据说有5000名教师在从事哲学教学。越南在思想方面同东南亚地区没有什么接触。和中国同样没有这种接触，因为越南虽然和中国共同有一种革命的经历，但是它不能忘却它曾受中国人支配达1000年的事实。还有，看来它所生发的共产主义鼓舞力，更多地来自苏联，而非来自中国。此外，越南同欧洲的接触看来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因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似乎在越南的思想史中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苏联的中亚地区，兼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不过前者在报告中没有提及，而对后者则提供了大量材料。这种佛教的历史似乎已被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化所淹没了。看来，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伊斯兰世界中前凯拉姆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相联系，已获得了伊斯兰哲学对马列主义的关系调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哲学也有悠久的历史。然而，这里的问题看来关系到它的伊斯兰教之前的波斯历史，这段波斯的历史不仅比其伊斯兰教时期远为古老和长久，而且在文化上也无疑是丰富的，令人感兴趣的。特别在霍梅尼领导的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由于现行政体仅同伊朗的伊斯兰教历史相一致，就此政体而言，割绝甚或忘却波斯古经中拜火教思想所开创的这一地区的早期思想史，毫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困难。注意一个事实，会令人感兴趣：苏联关于其中亚地区的哲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报告，提到拜火教及其关于对立面斗争的哲学观念,作为这个地区哲学学思想的开端.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全然没有提到这些哲学观念。事实上，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可被视为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伊斯兰教哲学支配的文化区域。诸如法拉比、伊本·西纳、伊本·路西德和安萨里等伟大的哲学家，并不只是这个地区任何个别国家的历史人物，而是中亚和西亚国家所处的整个地区的历史人物。然而，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大多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另一方面，在伊朗讲授哲学通常一向是用波斯语，因而，即使伊本·西那曾用波斯语写过一部著作，一些论述凯拉姆学派著作的学者也使用这种波斯语，但是，也许仍然有某种关于在该国教授哲学中使用阿拉伯语和使用波斯语的关系问题。

据说，伊朗在150年以前就已开始受近代哲学影响，当时，据法国人使哥比诺的推荐，一些笛卡儿的著作被译成波斯文。一些柏拉图的著作也被译成波斯文。德黑兰大学建立于1934年，并且在其文学院中创建了一个新系，称为哲学和教育系。然而，这样设系造成了只通晓现代哲学的人和只通晓传统伊斯兰教哲学的人的分野．这种情势几乎在该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简而言之，伊朗的哲学教学一直有传统哲学教学和现代哲学教学两种形式。关于伊斯兰教时代哲学的传统式的教学、同法学原理、教义传统、经典注释、凯拉姆学派、传统医学和天文学的教学，都在神学院中进行。伊斯兰教时代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的现代式的教学，都在大学中进行。看来,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哲学教学是在神学院中进行了”。

注意到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哲学中，法国实证主义在它们发展的一定时期起有重要作用，那会令人很感兴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的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所有其他国家所发现的一个问题，可表述为这样的问题：“西方世界从何而来，它的能力依赖于什么潜能？”换句话说“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说西方在一切方面一直支配我们，找们怎样使自己从西方

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的本性，似乎已以某种方式解决或消解了这个问题，犹如已经历了一种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已同样解决或消解了这个问题，不过后者采取一种不同于前者的方式。在原教旨主义革命之后，可期待的伊朗未来哲学发展的唯一可能，似乎是一种对过去的伊斯兰教正宗的复归。

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情势。同另一些也已正式公认它们自己本质上是伊斯兰教性质的国家中的哲学情势加以比较，这一点会令人感兴趣。我们可以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和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包括在这类里。在这些国家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先前曾是印度的一部分，而土耳其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可谓曾有世俗革命、前者是阿塔杜克·凯末尔领异的，后者列宁领导。这两场革命既早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建立，也早于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异看来值得注意，它们两者都深深关注它们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但后者同前者相比，显得对西方哲学更为开放、并且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一种更为多元的型态。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国家在哲学领域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许巴基斯坦的报告最确切地道破了这一点，巴基斯坦不仅力图撇开它曾是印度的一部分的历史，力图切断同那些时期的思想传统的联系，而且也力图在一切方面保留可兰经的至高权威，同时希望追随西方新近的逻辑、科学哲学和教学的思潮。与此不同，孟加拉国看来不仅显示了对其同印度分离之前的历史的意识，而且也表明，它充分评价这段历史，将达卡大学的哲学研究中心以提芙命名．纪念已故的G C 提芙教授，他曾在该校任教。孟加拉国的报告或许比土耳其的报告更为多元，它并没有过分地集中于伊斯兰教行学，特别是这种哲学的阿拉伯形式。

大多数提交报告的国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广义的哲学和狭义的哲学之间的区别，在广义的哲学和狭义的哲学两者之间游移不定地摇晃。一方面．人们难以将任何东西看作哲学．除非它是实质上的狭义的哲学。另一方面，除非它同普通的广义上可称为哲

学的东西有活生生的联系，否则，不能把它看作是同当代人所关注的事务相关联的。狭义的哲学在本性上主要是分析的，关注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以及论证同所要证实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广义而言哲学关注任何有关人、社会和自然及其同全体的关系的普遍性的见解，人们模糊地辨认这一全体，并且以想象和神话的形式勾画其轮廓。就此意见而言，这种哲学一方面同宗教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同文化紧密相关。多数的这些国家中的传统哲学，大都属于后一种广义的哲学，不过在多数国家，哲学和宗教的区分，特别是神学形式的哲学，即宗教所提供的关于真理的理性证实和辩明，同宗教本身之间的区分，很早就在它们的历史上形成了。在印度，有推理学（逻辑学）和哲学之间的清晰区别。K 穆尔蒂教授实际上对推理学“ 内明 ”(形而上学)为一方和‘ 我明 ”(灵魂学)为另一方,作出了区分。在菲律宾，认为通俗哲学在于有关生活行为的格言，埃默利塔 ·S奎多教授，将这种哲学当作土生土长的哲学来研究，她已报告了该国的哲学情况。实际上，据她所述．哲学的任务之一应当是“ 民族精神 ”的定形，它在菲律宾恰巧是受一种天主教的影响而注重上帝的。她试图借助于四个基本概念来表述这种人民的通俗哲学,这四个基本概念已被译为‘ 诸事信讬上帝 ”“ 信仰时间轮迴的观点 ”“ 与他人保持平和的关系 ”“ 谆谆教诲互助精神 ”,这一哲学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即个人对他人都是欠了情的、欠了债的。这种思想根源来自社会中人的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生活使每个人依靠他人。据奎多教授的见解，这些基本概念就是菲律宾人的生活的潜在动力。

这个狭义哲学和广义哲学的区别问题，实际上每个国家在其自己所处的情势中都是屡次遇到的。例如，新西兰的报告也说明了广义哲学和狭义哲学的区别。广义而言，涉及毛利人的哲学，这种哲学通过部族的知识学校流传发展。该报告也抱怨大学中的哲学教学过于注重分析，同生活问题相脱离，在该国的哲学系中不注意毛利人的哲学。

实际上，狭义的哲学提出了三个问题： (1)它同一个国家的民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关系；（2）在过去和现在．它同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在那些宗教仍然是一种活跃力量的国家里——因为现今许多亚洲国家里都是这种情况；(3)它同可称为当代社会改革和变迁问题的关系，这种社会改革和变迁构成了现时代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的历史形势。因而，巴塔恰利耶曾提到作为当代印度哲学中心问题之一是‘生动的对话问题”,这并不限于印度一国,而是现今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生活的一般特征。然而，在报告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述对此问题的认识的人们，看来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确切本性。实际上，巴塔恰利耶教授已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另外两个方面，可以用来补充上述提到的三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理解西方哲学而不必分有它所根植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只是一种普遍性问题的一个特殊事例，这种普遍性问题就是，理解者在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包括该文化的多种多样的产物）时，却因缺乏在此文化中的实际生活而理解不足。巴塔恰利耶教授还提到一个问题,即如果缺乏与在科学领域追求知识的人的‘生动对话”,那么,讲授或理解科学哲学的有效性又会怎样呢？

这个关于理解科学哲学的问题，已被一些人在报告中提出来了，他们强调在哲学研究中迫切需要引入某种自然科学主题或社会科学主题，这样，自然科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哲学，除了涉及一切领域的概括的认识论问题之外，还会包括某些有意义的具体内容。至于哲学同社会相关联的问题，或哲学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问题，这是一个较大的几乎关涉到现今全部理论知识领域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哲学领域中还有更大的重要意义，因为人们还不很清楚，哲学除了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之外，在社会情势中还可能起什么有用的作用。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报告里，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抱怨：哲学不是学生容易通晓的学科．学生们和雇主们都发觉它同就业目的不相干，它也并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显得同这些国家中正在进行的社会变迁过程相关联。只是在那些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的国家，

其社会变迁方向非常清晰的国家，才没有上述那些对哲学的否定态度。在极大多数我们已收到其报告的共产主义国家，把哲学当作在各种学校层次上教学的一种基本学科，并且看作是在人的理论事业和实践事业中的中心学科。在这些国家，研习哲学的学生获得工作也不困难。越南、中国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的报告都以鲜明的方式肯定了这点。然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相似的情形，那里已进行了不同类型的革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明确地陈述：

“如今，在革命中，伊朗哲学有着世界上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地位。如今哲学书籍大量地出版，过去，要是一本书出版2000册，会在书店里积压好些年，而现在一本书可出版5万册或10万册，几个月就卖光了”。

因此在那些经历激进革命的国家中哲学的地位，与那些不曾有激进革命并且在哲学领域中多少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哲学所拥有的地位，是根本不同的。

除了同一性问题和相关的如何同本国以往的思想传统相调和的问题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几乎所有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即知识赖以传授和创造的语言问题。一方面认为，除非以有关国家的生活语言来从事教学和研究，否则就不能出现真正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不安地认为，这些人民的语言如今对严肃的哲学论述，并不是合适的媒介工具，决不能同那些借以从事当代哲学探讨的国际性语言如英语、法语或德语相比，甚至不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性语言相比。这种情况适用于那些国家的往昔思想传统借以体现的语言，同样适用于真正的哲学创造力被认为现代才发生的那些外国的语言。因而，翻译梵文和中文如同翻译英文、法文和德文一样迫切需要。例如，韩国的报告提到有着5万本中文的朝鲜哲学著作有待翻译成现代朝鲜文。印度的情形甚至更为复杂，因为那里有许多地方语言，每种地方语言都以类似的方式遇到这个问题。印度中央政府承认至少有11种语言是该国的重要语言，另一些地区语言的中心也要求得到这种承认。几乎每个邦都确定其本邦的语言地

位，甚至在较高的学校层次上以地方语言进行教学。

虽然这个语言问题主要是根据翻译而提出来的，即要将哲学资料从过去的古典语言或从现行的西方语言，翻译成那些提供报告的各国的现行语言，但是，这里也有含蓄的假定，即在这里的任何国家，没有进行名副其实的哲学活动，用这里各国的现行语言所撰写的著作，并不值得该地区另一些国家的哲学家注意。这里的每一国家只对西方的哲学界中所发生的东西开放，其注意力只专注于西方的哲学界，而非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就西方的情况而言，一方面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另一方面在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方面所进行的哲学工作，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当然，有共产主义背景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是不同的。说中国、越南和苏联中亚地区的哲学家们面向西方哲学，当然、马列主义哲学除外，这或许是不正确的。但是，它们甚至漠视在亚洲其他国家中所发生的思想活动，即、便它们在地理上、文化上都邻近这些亚洲国家，这种说法并非不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范围之外的哲学，无论什么样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以西欧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哲学界。

在某种不同的层次，同古典语言相关联，又遇到这个问题。历史上伟大哲学家的原著，无论印度的，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或希腊的原著，都是用古典语言撰写的。在提供报告的这些国家中，多数学者不懂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他们必须依靠英文、法文或德文的译本。一般说，对他们本国历史上的古典著作，和对以希腊文和拉丁文所撰写的著作一样，都要依靠英文法文或德文的译本。实际上，甚至在菲律宾，由于长期天主教会的统治，在圣多 托马斯大学要求教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根据该国所提交的报告，现已放弃了这种要求。

以有关国家语言撰写研究论文的问题，提出另一个困难，即或是在有关国家中，或是在更广泛的国外的哲学界[redacted]语发表的任何著述。于是，只有以英文、法文或德文发表的[redacted]有机会得到当今哲学界的差强人意的注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上这些问题，只是所有这些提供报告的国家，在现代世界中面临的探求自我同一性的一些不同侧面。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尤其同哲学学科本身相关的问题。哲学的主题看来如此抽象、深奥，似乎同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所面对的社会变迁和改革问题毫不相关对大规模支持哲学研究是否值得，总是有某种疑惑，尤其当一国的资助经费少，而且有更重要的事宜急需经费时，就总有疑惑甚至长期不很清楚怎样的哲学教学才能对社会有用，甚或对有关人员有用。在知识领域内，学科一直在增加，每一学科都要求经费和关注。一些政府仍然倾向于逐渐挤掉那些被认为只有间接关系，或只有边沿价值或装饰价值的学科。教学职业一般不能挣回大量的金钱，比较聪颖的学生一般选择另一些职业，如工程学、医学，或者选择行政部门工作，或者在企业中当经理。甚至在学术性学科中,有就业定向的那些学科,如经济学、商业,吸引大量学生,因而念哲学的学生，一般地或者是那些不得在他处入学的人，或者是那些对哲学有非常强烈爱好的人。通常一位念哲学的学生只能希望得到哲学教师的工作，这类学生的就业机会由于提供哲学教学课目的学校的数量有限，而受到严格限制。大多数学校往往不提供哲学课程。甚至在被认为有悠久哲学历史的印度,在100多所大学中只有53所提供哲学课程，若考虑学院中的情形，也许哲学课程的比例甚至更令人不安。在另一些国家里存在同样情形,实际上这种情况因限制提供哲学课程的院校，而继续更为恶化。

因而，关于这种哲学情势的抱怨，几乎每个报告都提出来了。唯一的例外是那些经历共产主义类型的，或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类型的激进革命的国家，越南、中国、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常用来补救这种严峻情势的建议，是建立在这一个要求之上的，即在学院这一层次就讲授哲学，这样，念哲学的学生可望得到较多的工作机会。此外，唯一的其他的建议是，参与改变哲学作为抽象、深奥学科的众所周知的形象。澳大利亚的报告提议：

就给公众以信息而论，如果念哲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发挥较多的作用（并且证实他们自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就能够在论辩一些公共问题方面作出一些有用的事，例如，惩罚罪犯的合理方法，堕胎的是与非，避孕，保护私人生活，国家对公民生活干预的限度。参与这种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会起到一些对哲学有利的短期效果，而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参与就能确证，受过哲学教育的人，具有深入审察许多意义重大的公共问题的能力。例如，一个法律改革委员会可以适当地拥有一位哲学家作为其成员之一，许多其他公共委员会和机构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这样一些努力成功的话，许多年轻的学生会明白，哲学教育会给他们提供处理令人感兴趣的、关键性的公共问题的有价值的方法，会使他们学到在其他一些学科中学不到的方法。简而言之，需要以一种公众可见的方式，将有哲学根基的思想运用于社会问题。那么，这就会提供一种运用哲学本身来判断念哲学的学生的教育质量的机会；公众能根据哲学家们在公共场所运用他们的技巧的能力来判断这一点。

另一些紧密相关的同业问题，涉及训练有素的教师的短缺，可得到的书籍和期刊甚少，经费不足，缺乏发表研究著作的有利条件，等等。关于获得哲学教育的人力的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并不相同。例如，象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许多哲学教师甚至不曾获得哲学学科的硕士学位。实际上，菲律宾的报告陈述：“必须说服全国成百上千的哲学教师，去追求哲学硕士学位，或者，如果他们已开始追求了，要说服他们写一篇毕业论文去完成攻读这一学位”。在孟加拉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同样的情形。对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的同业问题，以及念哲学、研究哲学的问题，都曾详细地讨论过。尽管穆尔蒂教授的讨论主要限于印度，但是它也与其他一些国家有关，正如他讨论的多数问题，对在本次会议发言的多数国家来说，恰好是共同的问题。

除了澳大利亚主张哲学教师应参与公共事务以改变他们的学科的形象之外．还有新西兰的一个提议：哲学家应使他们的活动多样

化，应当在课程中包括某种伦理学教育；法学理论和法哲学应当在法学院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研究保健卫生的哲学应当受到鼓励；在医学院和护士学院应当有某些哲学教学。除了这些使哲学学习多样化的提议之外，还提议：哲学教学应当有机地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些具体学科相结合。巴基斯坦的报告就强调："事实上，不能将哲学视为纯粹只是一门人文学科，也不应设想一位有科学专业方向的学生，必定不能赏识哲学。"

苏联中亚地区的共和国的报告，甚至进而主张：

"在现代条件下，哲学是一种影响科学的世界观；它也是一种一般的方法论，一种认识和逻辑的理论。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能够发挥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认识和逻辑的作用，只要它以全部科学成就为基础，并且用最新科学发现来丰富它的范畴、理论和规律。"

还有一个一再提出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建立一个"亚洲哲学研究中心"，以促进该地区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之间的接触。这个中心也可以从事东西方的哲学对话，帮助该地区各国哲学活动的发展。如果实现这个建议，这会有助于更广泛地了解亚洲不同国家所从事的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避免哲学活动过分集中于欧洲的现象，这种哲学活动过分集中于欧洲的现象，是目前形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实现这个建议，也会有助于使西方的学者注意亚洲国家所从事的哲学工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比现有的国际哲学团体更具有国际性的从事哲学事业的学者团体。

（姚介厚译）

第二部分 国 家 报 告

澳 大 利 亚

罗伯特·布朗

历史简介

我们应首先适当说明哲学在澳大利亚发展的历史，这种发展的理智渊源和它的社会背景。我们现在掌握的是相当纷繁复杂的综合信息材料，这些材料涉及早期的教师和他们的系，主要来自大学的记录、出版物、报纸的报道，以及课堂教学的讲义。我们还掌握这样一些信息，即澳大利亚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它们较鲜明的机构特点，以及哲学被考虑安排在大学全部教学课程中的方法。但是，直到这一较早的材料被组织起来用于系统论述澳大利亚的人文学科在19世纪末期的社会作用这一时间止，信息本身很少赢得知识分子的兴趣，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人在哲学方面的认真研究直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

澳大利亚首批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们照搬了苏格兰大学的模式，是经过改革的牛津和剑桥及伦顿大学学院这类英国大学。这个阶段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正值淘金热,正是随着金矿发现而来的财富和人口的突然增加，能够使州政府资助这两个大学。其他州在资源和人口方面不及这两个州。所以稍后它们才有大学：南澳大利亚大学，1874年；塔斯马尼亚大学，1890年；昆士兰大学，1909年；及西澳大利亚大学，1911

年。因此，澳大利亚的哲学史就象其他大学学科的历史一样，也是比较短的。

哲学的首批 3 个教授席位是在 1886年至1894几年中相继设立的，而且这 3 个教授席位全部被苏格兰大学的毕业生所占据。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了某些情况，即苏格兰教育及其成果在澳大利亚学术生活中所起作用的重要影响。最早在大学开设哲学讲座的人似乎是 H．劳里 ①，他是省立澳大利亚报纸的编辑，讲座是在 1882年在墨尔本大学开设的。 4 年后，劳里被指定为墨尔本大学的第一位哲学教授，他的教授职位一直保持到 1911年。我们知道，劳里“ 以讲授符号逻辑为特点 ”,他曾详细地讲授 J．S．穆勒和 H．斯宾塞这类 19世纪思想家的思想，并且他的课程包括反映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贝克莱、休谟、康德和黑格尔这类人物的思想。

人们现在仍熟记劳里，是因为他的著作《苏格兰哲学和其国家的发展》,该书记述了从哈奇森到费里尔的苏格兰哲学史。它的出版日期 （1902年）使它成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作家所发表的最早一部关于哲学的重要著作——虽然不是第一部哲学著作。劳里的书涉及他所离开的国家的思想家，而不是他移居所至的国家的思想家，这一点是那个时期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和特点所在。那个时期的澳大利亚并无自己的哲学发展：一般思想，甚至比人和其他物品尤甚，都是从英国舶入的。澳大利亚舶出的早期天才人物，如《空间、时间和神》（1920年)和《美和其他形式的价值》（1933年）两书的作者 S．亚历山大就是在英国受教育，然后在国外从事自己工作的。

澳大利亚的第二个哲学教授头衔是 1890年由悉尼大学设立的。领有这个头衔的第一个人是F．安德森,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苏格兰人，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尔后为巴里奥尔学院院长的E．凯尔德的助教。安德森 1886年来到澳大利亚,任墨尔本一座教堂的助理，两年后授予开设哲学讲座的职位。就象在苏格兰大学的习惯一样，安德森的讲座涉及多种多样的题目：伦理学、形而上学、希腊哲学、逻辑、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安德森是一位把黑格

尔主义和传统的苏格兰人观点统一起来的基督教理想主义者。在他发表一些论及宗教问题、教育和伦理学的文章的同时，他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本科生的教学上，为一般公众和工人教育联合会组织通俗课程，以及提高为中学教师培训制度等方面。在安德森1922年退休后一年，这个哲学教授职位由B.马奇奥接替，他曾帮助创建了澳大利西亚心理学和哲学学会。安德森成为这个学会的杂志《澳大利西亚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的第一任编辑。他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6年。

澳大利亚第三个早期哲学教授职位是1894年在阿德雷德大学设立的，W.米歇尔，一位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得到这个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23年，他除了讲授逻辑、伦理学和心理学外，还讲授了几年英国语言和文学、经济学和教育学。他在该大学后来成了名誉副校长，不久又成为名誉校长，他对该校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象悉尼大学的安德森一样，他帮助修改文科的课程，并帮助创设了训练中学教师的课程计划。米歇尔是研究生教育的有力支持者，因此他支持在英国文学、经济学和教育学这类学科中建立教授职位。他发表的主要著作《心灵的结构和成长》（1902），当时曾受到英国评论家的称赞，并的确对后来一些作者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著有《思想的本质》（1939）的美国哲学家B.布兰沙德。J.帕斯莫尔在《哲学一百年》一书中评价说，米歇尔的书“是唯一试图用后布拉德雷式的观点详尽论述19世纪心理学的书”（P.314）。此书在阿德雷德大学后来的25年中一直被用做教材，无疑对阿德雷德大学的几代学生都产生过影响。在1925年和1926年期间，米歇尔在阿伯丁大学做吉福德讲座讲演，这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澳大利亚人做这种讲演。讲演的第一系列以《心灵在世界中的地位》为标题于1933年发表，第二系列，因其手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被毁，所以从未能出版。至少有一个英国批评家，H.B.阿克顿在回顾已出版的那一册时，发现它艰深难解，并忽视了新近的哲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哲学导师们沿袭了苏格兰那种向规模较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